

在山野寻找一群老虎

□万小川

《猛虎下山》是李修文睽违多年的长篇新作。小说一改《滴泪痣》《捆绑上天堂》的爱情叙事，将视线转向底层下岗工人。正如他在小说的首发分享会上所说：“它的出发点，就是想写出一个有名有姓的人。”由具体的人，延展到时代症候，这是这部小说的野心。

读到《猛虎下山》这个题目时，我们或许会想到百兽之王的威风之姿。然而，翻开第一章，迎面而来的是迷路、饥饿，以及被独狼追逼的狼狽景象。继续深入文本，一个个处处碰壁的弱者形象映入眼帘。

相较于下山的老虎，下岗才是令小说主人公刘丰收更为畏惧的“猛虎”。在下岗潮汹涌来袭之时，他既要担忧生计问题，又要面对妻子的责难、儿子的忽视和同事的鄙夷。他为了不下岗而加入打虎队，误打误撞成了队长，体验到权力的滋味。他可以肆意使唤队员，刁难那个在过去处处胜过自己的张红旗。然而，他很快发现山中已无老虎。为了维持打虎队的存在，众人继续在山中寻找。事情终于败露，队伍解散，权力化为泡影，生计也成问题。心绪如麻的刘丰收独自上山，在酒精和中药的双重作用下，他披着虎皮布置陷阱，假戏真做，最终变成了自己所追逐的老虎。小说讲述的就是这样一个弱者渴望权力，最终被异化成“非人”的故事。

如果将人物命运的节点标示出来，我们能得到一条跌宕的波浪线。刘丰收时而灰头土脸，时而得意洋洋，大起大落，扣人心弦，使小说显露出通俗传奇的气质。有一条线索潜藏于主线情节之下——刘丰收逐渐膨胀的权力欲望。与曲折的主线不同的是，这条线索是不断向上的，但又与前者交织缠绕。起初，刘丰收并不渴望权力，这种欲望的重要诱因是来自家庭的压力。妻子林小莉时常将他与脱硫车间

的副组长张红旗作比较，甚至对张怀有爱慕之情；他的儿子则瞧不起他。当虎患兴起，厂长宣布打虎就能不下岗时，也是林小莉怂恿他铤而走险，上山打虎。

在此时，“老虎”这一意象有三层内涵：真实的老虎、厂长、下岗，对应生物链中的权力、炼钢厂中的权力，以及决定底层命运的权力。三者构成一座权力金字塔。刘丰收对“老虎”的情感是单一的——畏惧。他既害怕老虎吃掉自己，又畏惧厂长，也担心下岗后无法谋生。起初，他也不愿意加入打虎队，是林小莉的一席话让他彻底屈服：“你要是下了岗，咱们这一家人，命就全丢了。”与直面老虎和厂长相比，下岗所造成的危害严重得多。沉重的塔尖压在刘丰收的肩膀上，使他克服了对老虎和厂长的畏惧。

接下来，他阴差阳错成了队长，权力心由此萌芽。他开始享受被众人献媚的快感，在厂区横行霸道。当杜向东挑战他的权威时，他果断拉拢同党，排除异己，俨然权力场的高手。在这一阶段，“老虎”一方面是队员们不必下岗的免死金牌，另一方面成了刘丰收巩固领导权力的工具。正因为前者，刘丰收才能笼络人心。他面临的第一个挑战者是杜向东。在对付杜向东时，他的师弟马忠初步显露出残忍的性格：把杜向东引进密林，捅下马蜂窝将他蜇得半死。这仿佛打开了潘多拉魔盒，使刘丰收意识到，维护权力是可以不择手段的。在对付第二个挑战者张红旗时，他动用了更为残忍的手段：开除、殴打、囚禁。权力腐蚀着他的人性，老虎慢慢踱进他的内心。

尽管队员们对于山中无老虎的事实都心知肚明，但他们为了守住“免死金牌”，一言不发地将这场戏演下去。当事实成为真正的事实时，“老虎”的位置空缺出来，下岗再次成为他们生活的核心。原本作为队长的刘丰收被剥夺了权力，从

颐指气使到挣扎求生，其心理落差可想而知。他不再安于平常生活，对于权力（具象化为老虎），他疯狂地渴望、追求，而那种结构性的恐惧也奇迹般地消失了。对于另一些人（譬如马忠）而言，机遇从天而降：谁抓住老虎，谁就能免于下岗，甚至获得车间主任级别的荣誉。马忠再次显露出他的野心。从此，师兄弟分道扬镳，权力对于人际关系和人类情感的威胁可见一斑。

小说设置了一个荒诞的尾声：刘丰收变成一头真正的老虎，遭到全厂人的围剿（包括他的妻子和儿子），最后在群虎的帮助下返回山林。这使人想到卡夫卡的著作《变形记》，但二者有所不同。在《猛虎下山》中，变形是异化的象征性表达。刘丰收的权力欲望不断膨胀，并在权力被剥夺后达到顶峰。起初，他拒绝食用生肉，在潜意识里对于变形是抗拒的。当他目睹妻子和儿子遭受暴行时，他决定“破戒”，大啖生肉，以老虎之姿保卫家人。李修文使用了“劫法场”这个古典文学的词汇，有意识地将传统小说的桥段融入现代主义的情节中，使通俗和先锋的元素相融相生。

当变成老虎的刘丰收偶遇厂长时，他胆怯了。厂长看穿他的心思，将红色安全帽分发给工人们，“百顶红色安全帽”涌动过来，将刘丰收团团围住。这是权力对他的步步紧逼。后来是虎群将他解救，将红色安全帽们吓回厂区。在最后一章，李修文留下意味深长的祝愿：“就像我，此一去，哪怕还是找不到老虎们，不要紧，今天找不到，明天我再接着找，今年找不到，明年我再接着找。”“老虎”不再是将人逼入绝境的权力，而是一种源自民间的力量。正如李修文所说，这种力量是隐性的，需要被发掘、寻找，但终究存在，并充满希望。

（作者为北京师范大学硕士研究生）



《猛虎下山》
李修文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明末清初戏曲“独重节烈”研究》
张惠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旧纸边上》
薛原 著
金城出版社

明末清初剧作家的集体困境

□李汇群

明清鼎革之际，之后的那些戏曲家，都是战争的幸存者，经历过天崩地裂的动荡和摧毁之后，他们以诉诸笔墨、场上搬演的形式，来记录那些被侮辱、被伤害，并以死亡直面、回击侮辱伤害的女性，这种记录本身就是有意义的，它们所凝结的那段记忆，体现了弱者面对绝对强权所爆发的反抗不屈的精神，即使经历时间冲刷、世事更迭，依然在历史深处闪烁着生动的光芒。张惠新作《明末清初戏曲“独重节烈”研究》选择了明清易代之际，即明末清初（天启至康熙四十年）近八十年时间里戏曲剧本所呈现的“独重节烈”风貌作为研究对象，从作品、作者、读者三重维度展开，探讨这种“独重节烈”书写涌现的成因，观察敏锐独到，具有很强的启发性。

在中国古代文学中，向来存在着某种传统，即男性通过书写理想女性，以文学创作来抚平内心伤痛，这几乎已经成为近年来古代文学研究领域的共识。经历过明清易代的男性文人，虽然一直是礼教的倡导者，由于无力在面临死亡挑战时以身殉道，只能转而在他们的女性书写中，通过创造贞洁忠烈的女性形象，寻求某种心理上的慰藉和依托。

在这个群体中，有儒生、遗民、遗臣、贰臣、夹缝人、无名氏、托钵山人等，他们的政治主张、政治倾向都各有不同，但诚如作者所提到的，他们都“选择了相似的表现主题，即‘贞节烈女’，然而在不同作家的笔下，又有着不同的内涵，既有泛彼柏舟、之死靡他的贞，也有一与之醮、终身不改的节；既有为主殒身的义烈，亦有为夫殉身的节烈，也有为父复仇的孝烈，以及为国雪耻的忠烈”。

这幅恢宏的图景，也折射出男性剧作家群体的复杂心曲：他们或咏志言志，以女性孝烈复仇寄托为君父复仇的孝烈幻梦，如难忘家仇的王夫之；或自比自励，讴歌义烈侍妾和忠仆，如出身卑微的李玉；或接力续写，共作节烈群芳谱寄望复仇复国，如身世扑朔的《铁冠图》作者；或自伤自怜，描述矜持自重的佳人以寄寓不得以降清的隐衷，如进退维谷的吴伟业；或自相矛盾，刻画极端贞节女子以表达自悔之心，如辗转徘徊的孟称舜；或委曲求全，以剧中心上人的坚贞守节慰藉不得意的失落青春，如前后不一的袁于令；或绝意功名，将坚贞节义作为戏曲“噱头”，如托钵游食的李渔；或有意增删，将贞节看作教化人心的关键所在，如先后仕清的洪升和孔尚任。

更难得的是，对于名声不佳但才华出众的剧作者，作者也并未采取回避态度，而是特意穿插了对阮大铖的一章分析，以求从客观实际出发探讨这类作者的特殊性。阮大铖为人反复无常，变幻不定，后被列入《明史·奸臣传》，且《明史·艺文志》及各类丛书包括《四库全书》等都将其作抛除在外，可见从朝堂到士林，对其人评价都不佳。但他才华横溢，所作《石巢四种曲》素来被视为佳作，作者分析了《春灯谜》《燕子笺》中所塑造的机灵权变、将贞节与谋利结合得圆融自然的女性形象，指出在这类女性身上，体现了深刻的投机心理，和阮大铖“骑墙派”的作风相吻合，而对她们的塑造则反映了阮大铖将自我与人物形象高度认同，从而获得内心安慰的心理。如此分析，娓娓道来，丝丝入扣，不仅反映了作者对明清之际文学文本和史料掌握细致，更证明了她作为研究者具有观察入微、体察入心的出色素质，这必将有益于她在学术之路上取得更精深的造诣。

（作者为中国传媒大学副教授）

写在《旧纸边上》的边上

□薛原

这本《旧纸边上》是我近些年在金城出版社继出版《闲话文人》《画家物语》《海上日记》《画家物语·增补版》和《画室风景》之后的又一本随笔集。内容与风格仍延续了之前“闲话文人”的路数，也就是在日常阅读中寻觅那些远去的现代文人的生平踪影与背景，用图书文献和书信日记里的史料呈现和还原那些逝去的人物面貌和风景，也是夜读的趣味与点滴札记。

例如《物质生活里的大先生》谈鲁迅：“若用今天的舆论眼光，鲁迅最后的人生之旅其实是有问题的：一位四十七八岁的著名作家和大学教授，离开在北京的家，和自己的女学生跑到上海同居，并有了一个儿子。试想一下若放在今天，这样的浪漫故事定会成为网络上的热搜新闻。当然，我们不能以今天的眼光来看待现代历史上的人和事，就像读胡适的日记，对他羡慕马寅初身体好坚持冬天洗凉水澡，并进而释然难怪马寅初有两位妻子侍候他的生活时，不能责骂马寅初道德有亏，因为在那个时代，这种现象并非为世俗道德所不容。”

再如《丁悚：海上艺坛四十年》一文里如此评述丁悚的回忆：“从他的回忆录里可以看到他与友人的生活状态和上海滩的文人圈。他的这部回忆录的文章都不长，看他当年的这些专栏文字，若放到今天，犹如在看他每天一更的个人公号或微信朋友圈：他所谈所写都是他个人生活里所见所闻的轶事或点滴讲述，不过在叙述里也有鲜明的态度判断，例如他写《张丹斧怀念严独鹤》：严独鹤待人接物一向抱不得罪人宗旨，尤其是在同人圈里，更是谦和，但张丹斧对他却一次二次一遇机会尽在文字中极挖苦之能事，有好几年之久，直至张丹斧死后方休。严独鹤自己也一直不知获咎缘由。”

再如《两个艺术“疯子”的相遇》一文里谈张仃与他的夫人陈布文：“20世纪80年代初的张仃，其个人在中国当代美术界的地位与影响都达到了高峰，尤其是他主持创作的北京机场壁画工程更是给他带来深远的影响。但在他的个人生活中，却发生了意外，这就是他夫人陈布文的去世。关于陈布文去世的确切原因，现在我看到的相关出版物中往往语焉不详，或者匆匆一

笔带过，譬如在《春天的来客：陈布文文集》一书的最后，附了一篇《陈布文小传》，结尾一句说陈布文六十五岁那一年因一个偶然发现而万念俱灰，卧床不食数月后辞世……读到这一句，不由得伤感，陈布文的偶然发现又是什么呢？又是什么样的偶然发现能让一位已过六旬的老人万念俱灰呢？因为有这样好奇，细读《陈布文文集》所收的文章，尤其是她写的未曾发表过的小说——显然以身边熟人为原型所写，还有她的日记，可以寻觅到一些她情感生活和对亲人朋友们的看法，而这其中，就有她对他们夫妇的小朋友灰娃的描绘和观感。当然，这一切还不能确证她六十五岁那一年偶然发现的又是什么，只能增加对他们那一代人情感与生活的想象和感叹。”

该书封面图案系选用唐吟方于今年“春分”里的国画小品；封底图案选用薛寒冰的油画写生《阶梯》。不管是春夜独行林中路，还是阶梯寂静待人来，都是一种关于“人与事”的点滴心境，也是遥望远方与寻觅书林的心底风景。

（作者为媒体从业者、知名出版人）